

文学“小史”与历史“大事”

——“新史学”与胡适《谈新诗》的批评理路

罗义华 骆羽芯

摘要 胡适兼具新史学家与新文学家的身份,他的新诗批评彰显了“以史入文”和“以文入史”的辩证法。一方面,他取径“新史学”的核心观念与方法,将“进化”史观、科学实证等融进《谈新诗》一文,使其呈现历史和科学的双重维度,依循着一条“以史入文”的批评理路。另一方面,他以《谈新诗》一文参与新诗史的建构又折射出其以新诗批评进入历史的文学诉求,体现了“以文入史”的批评意图。在文史互动视域下钩沉“新史学”与《谈新诗》的互动渊源与路径,为窥见“新史学”在胡适文学观念中的位置与功能、辨析“新史学”与“新文学”之间的隐秘联系,提供了一个具体而微的佐证。

关键词 胡适;新史学;《谈新诗》;新诗批评;新文学;文史互动

中图分类号 I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7320(2024)03-0125-08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3BZW116)

1902年,梁启超提出“史界革命”、建设“新史学”的主张,在此前后章太炎、邓实、陈黻宸、夏曾佑、刘师培、王国维等人在新史学领域各有实践。同年,梁启超又拉开了“小说界革命”的序幕,与“诗界革命”“文界革命”一同掀起清末民初文学革新浪潮。在梁启超新民救国的愿景中,“新史学”与“新文学”各承其使命而又互融互通。需要指出的是,梁启超、章太炎、王国维、刘师培、胡适、鲁迅等两代学人兼包并蓄,文史双栖,此中蕴含深刻的文学发生学意义,而“新史学”与“新文学”之互动双生实为新文学发生研究题中应有之义。

1919年,胡适发表《谈新诗——八年来一件大事》(以下简称《谈新诗》)一文。该文试图勾勒新诗的时代风貌,被视为“诗的创造和批评的金科玉律”^[1](P241)而影响深远。到目前为止,学界对胡适《谈新诗》的新诗创造和批评意义等相关话题的讨论已较为充分^①,但相关研究较少从文史互动视域出发考察“新史学”与胡适《谈新诗》的学术渊源,对二者互动交融的历史细节关注不够。值得注意的是,胡适与梁启超等两代学人之间存在深厚的纽带关系,尤其是梁启超的“新史学”已内化为一种不可或缺的学术资源在胡适那里发挥着重要的启蒙作用,对其文学史观、历史研究方法乃至述学逻辑的形成等产生了多维影响。具体到《谈新诗》一文而言,其历史和科学两个批评维度高度契合了“新史学”的思想进路,也即是说,新史家的观念和方法在一定意义上内在规约了《谈新诗》双重维度的生成;《谈新诗》一文“以文入史”的批评旨趣又延续了“新史学”的价值取向,隐含着“新史学”对于中国现代新诗的发生学意义。因此,在跨学科视域下,关于二者的关联性思考或蕴含着《谈新诗》研究的崭新空间,有助于进一步敞开《谈新诗》的历史意蕴与时代价值。钩稽二者互动的渊源和路径也有助于窥见“新史学”在胡适文学观念中的位置

^① 学界的立论大致呈现出两种倾向:一是揭示《谈新诗》在文学史上对于“诗体大解放”的理论价值,二是阐释《谈新诗》为新诗批评与创作方面提供的实践指导意义。

与功能并由此透视“新史学”与“新文学”之间的隐秘联系。

一、进化史观：“新史学”与《谈新诗》的理论链接

晚清以降,自严译《天演论》问世,国人历史观念为之一变,历史循环论遂逐步让位于历史进化论。进化史观作为一种崭新的思维方式,影响及于史学、文学、哲学诸多领域,中国知识分子猛然发现“中国有过去而无历史”^[2](P255)。中国“无史”的危机促使先觉者们自觉运用进化史观建构中国“新史学”的理论体系和实践范式。1902年,梁启超在《新史学》中指出:“历史者,叙述进化之现象也。”“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3](P501-504)这标志着中国史学领域摆脱了“一治一乱”史观的支配,进入进化史观统治下的新时代^[4](P1)。与进化史观、“文明”史观、科学方法密切勾连的“新史学”,随即被推到“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3](P501)的时代高度,“以史学言进化之理”^[3](P371)成为新史家的指导思想,“以过去之进化导未来之进化”^[3](P505)成为其职责所在。正如周予同所言,梁启超的“全部史观建筑在进化论之上!而且不仅以叙述历史的演进现象为满足,并进而探求历史演进的基因”^[5](P539)。与此同时,章太炎也描绘了运用进化史观撰述中国通史的愿景:“平日有修《中国通志》之志……然所贵乎通史者,固有二方面:一方以发明社会政治进化衰微之原理为主,则于典志见之;一方以鼓舞民气、启导方来为主,则亦必于纪传见之。”^[6](P167)此外,夏曾佑的《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刘师培的《中国历史教科书》等史学著述也都以进化史观为指导参与了中国历史书写的深刻变革。

具有进化印记的“新史学”观念逾越了传统史观对文学的认知,对“新文学”的构建产生着重要影响。胡适所言“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的著名论断,即在文学中言说进化之公理,集中体现了“新史学”在“新文学”中的理论投射。胡适自称其“对于文学的态度,始终只是一个历史进化的态度”^[7](P253)。何以如此?他分说道:“我的思想受两个人的影响最大:一个是赫胥黎,一个是杜威先生。”^[8](P507)但值得一提的是,其历史进化的文学观念还与梁启超的“新史学”颇有渊源。胡适曾在《四十自述》中大段引述梁氏《新民说·论进步》的观点,诚如其所言:“我个人受了梁先生无穷的恩惠”,由于严复的“文字太古雅,所以少年人受他的影响没有梁启超的影响大。梁先生的文章,明白晓畅之中,带着浓挚的热情,使读的人不能不跟着他走,不能不跟着他想……我们在那个时代读这样的文字,没有一个人不受他的震荡感动的”^[9](P71-72)。李敖也以为,从“旧书堆”到接触《新民丛报》等梁启超一类的著述,是胡适“一生中的重要转折”^[10](P126)。将梁启超的“新史学”著述视为胡适重要的学术资源,并不为过。在梁氏“新民说”总体视阈中,“新史学”与“新文学”互为两翼^[11],胡适则主要藉由“新民说”而接受了“新史学”的熏染,“新史学”在一定程度上构成其文学观念的思想底蕴,《谈新诗》可见一斑。以上简要梳理,意在揭橥胡适文学进化史观生成的学术背景与理论印记,有助于掘进《谈新诗》与“新史学”的内在联结。

具体而言,《谈新诗》是胡适以历史进化眼光进行新诗批评的成果,其理论渊源可追溯到“新史学”的核心观念。《谈新诗》明确指出:“我们若用历史进化的眼光来看中国诗的变迁,方可看出自《三百篇》到现在,诗的进化没有一回不是跟着诗体的进化来的。”^[12](P137)胡适通过诗体四次大解放的言说方式,将诗体的进化历史进行了一番清源式梳理。从《三百篇》至南方骚赋体被其视为诗体的第一次解放,骚赋体至汉以后的五七言古诗为第二次解放,词的出现被视为第三次解放,晚近以来的新诗则是第四次大解放。一方面,《谈新诗》中诗体进化的理论立场接续了梁启超文体进化的思想逻辑。1903年,梁启超在《小说丛话》有云:“文学之进化有一大关键,即由古语之文学,变为俗语之文学是也。各国文学史之开展,靡不循此轨道。”^[13](P82)两相对照,折射出二者思想进程中进化史观的内在链接。另一方面,胡适如此学术式的梳理与划分,亦受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七分法”(将中国学术思想史分为七个时代)的启发,他称梁氏的这部“新史学”之作:“是第一次用历史眼光整理中国旧学术思想,第一次给我们一个‘学术史’的见解。所以我最爱读这篇文章。”^[9](P73)可以说,“新史学”赋予了胡适新诗批评一种进化史观的思想支援。胡适在《答朱经农》一文中初步明确了“诗体的解放”的具体内涵:“有什么材

料,做什么诗;有什么话,说什么话;把从前一切束缚诗神的自由的枷锁镣铐,拢统推翻”^[12](P71-72)。《谈新诗》则流露出从历史上寻求“诗体的解放”之合法依据的意图,即从旧体诗至新体诗的进化历史探寻新诗的未来发展趋势。以此而言,《谈新诗》的批评旨趣承续了“新史学”的“以过去之进化导未来之进化”^[13](P505)之路,而彰显出深远的历史维度。

此外,《谈新诗》是一个充满张力的批评文本,揭橥了新诗进化的两种方式:在“自然进化”之外,还依靠一种“有意的鼓吹”。就新体诗的发展而言,胡适认为,若仅依靠“自然进化”是不够的,这种“无意的演进,是很慢的,是不经济的”^[17](P202),只有将“自然进化”与“有意的鼓吹”相结合,形成二者双生互动、相辅相行的局面,才能在短时间内猝然实现诗界革命的主张。他在《中国新文学运动小史》一文更为明确阐释了此观点:

我们特别指出白话文学是中国文学史上的“自然趋势”,是不够打倒死文学的权威的,还必须有一种自觉的,有意的主张,方才能够做到文学革命的效果。^[9](P127)

在胡适看来,“自然趋势”与“有意的主张”相互交织方可合力促成文学革命的实现。若要探寻链接二者的理论依据,“新史学”则是不可忽视的一脉,此诚如其所言:“《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给我开辟了一个新世界,使我知道《四书》《五经》之外中国还有学术思想。”^[19](P73)梁氏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指出,中国胚胎时代的学术思想为我国“一切道德、法律、制度、学艺之源泉”,原因有二:

一曰由于天然者。盖其地理之现象、空界之状态,能使初民对于上天,而生出种种之观念也。二曰由于人为者。盖哲王先觉利导民族之特性,因而以天事比附人事以为群利也。^[14](P20)

胡适在《谈新诗》提出的新诗进化的两种方式(“自然进化”和“有意的鼓吹”)与梁启超所言学术思想进化的两种途径,相互印证,遥相呼应。《谈新诗》对新诗进化方式的揭示,无疑与“新史学”的进化史观相遇合,其新诗批评亦藉此获得历史之维。

二、科学实证：“新史学”与《谈新诗》的批评路径和方法

早在1904年,梁启超在续写《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时将近世学派“由演绎的进于归纳的”思想方法谓之“科学之精神”^[14](P94)。1922年,他在《美术与科学》中称现代文化的根柢是“科学”^[15](P357),又在《科学精神与东西文化》一文中赋予“科学精神”以明确内涵:“有系统之真智识,叫做科学。可以教人求得有系统之真智识的方法,叫做科学精神。”^[15](P410)梁启超将“科学精神”视为解救我国两千年思想界与学术界病症的良药,强调学术研究要找得出证据,说得出理由。诚如许冠三在《新史学九十年》所云:“从新会梁氏朦胧的‘历史科学’和‘科学的历史’观念起,新史学发展的主流始终在‘科学化’,历来的巨子,莫不以提高历史学的‘科学’质素为职志。”^[16](P2)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作为“新史学”的重要质素,也一定程度影响到胡适的治学路径。

胡适强调史学研究须言之有据,十分警惕“胡乱作概括论断”^[17](P43)的乱象。1920年,他做《水浒传》考证时自我揶揄说有“历史癖与考据癖”^[12](P378),1923年他又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提出以科学的方法整理国故^[7](P17)。1930年,他在《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中也明确指出:“科学精神在于寻求事实,寻求真理。科学态度在于撇开成见,搁起感情,只认得事实,只跟着证据走。科学方法只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十个字。”^[8](P518-519)由此看来,胡适在梁启超科学精神的基础上,更进一步阐释了科学的态度和方法,强调科学实证,“使中国史学完全脱离经学的羁绊而独立”^[15](P542),助推了“新史学”的发展进路。事实上,文史身份交叠的胡适不仅将科学实证用于史学研究,还将其施展于文学领域,在

文史之间自由通行,一定意义上为新文学的异军突起提供了可能性。

尽管《文心雕龙》《诗品》这类评鉴诗文的著作古已有之,但它们往往被列入“经史子集”的集部,直至明代才拥有相对独立的位置,被称为诗文评。近代以来,伴随着“新史学”的兴起,文学逐步确立了自身独立的学科地位,文学批评也随之发生现代转型。不同于大多数古代诗文评的感性、直觉、零碎,现代文学批评呈现出理性、科学、系统的整体面貌。旨在确证新诗合法地位的《谈新诗》一文便集中体现了其时新诗批评的理路旨趣。胡适取径“新史学”科学实证的路径与方法,使之呈现出异于诗文评的全新面影,为其后的新诗创作与批评指明了方向。

《谈新诗》开篇即指出:“只有国语的韵文——所谓‘新诗’——还脱不了许多人的怀疑。”^[121](P133-134)如何克服这个窘境呢?“只有一个法子,就是科学家的试验方法。”^[181](P82)《谈新诗》一文以先声夺人之势,试图以科学实证的方法来确证白话诗的合法性。《尝试集》的两篇自序分别有言:

总之,白话之能不能作诗,此一问题全待吾辈解决。解决之法,不在乞怜古人,谓古之所无,今必不可有,而在吾辈实地试验。一次“完全失败”,何妨再来?若一次失败,便“期期以为不可”,此岂科学的精神所许乎?^[181](P78)

要看白话是不是可以做好诗,要看白话诗是不是比文言诗要更好一点。这是我们这班白话诗人的“实验的精神”。^[181](P82)

这种科学和实验的精神即胡适所称“文学的实验主义”^[181](P78),与《谈新诗》中科学实证的旨趣和姿态形成一种互文对照。科学实证是如何嵌入《谈新诗》中去的呢?其一,在于对“诗体的大解放”的提倡。《谈新诗》指出:“文学革命的运动,不论古今中外,大概都是从‘文的形式’一方面下手,大概都是先要求语言文字文体等方面的大解放。”^[121](P134)胡适注意到文体解放对于文学革命的重要性。为此,诗体的大解放便成为胡适科学试验路径与方法的最佳选择。只有诗体完全解放,“丰富的材料,精密的观察,高深的理想,复杂的感情,方才能跑到诗里去”^[121](P134)。这一认识彰显出新史家的科学理性眼光与思维方式。其二,是关于“自然的音节”的试验。《谈新诗》指出新诗的大多数趋势朝向一个公共方向,即“自然的音节”。胡适称“自己也常用双声叠韵的法子来帮助音节的和谐”^[121](P142),在《尝试集》再版自序中也指出其诗“代表二、三十种音节上的试验”^[181](P86)。他对“自然的音节”的实践也体现了科学试验精神。胡适将“自然”视为进化的一种方式,其笔下的“自然”一词最终便指归于进化,而进化这一个于国人有说服力的观念,有力辩护了新诗在中国诗史上的合法性^[191](P17)。在胡适这里,进化即“科学”,以进化建构新诗的合法性,以“科学”凸显《谈新诗》一文批评的公共性,从而将“个人批评转化为公共批评”^[201],这就最大程度地提升了公众对于新诗的认同感与接受度。其三,《谈新诗》涵盖了“问题与方法”,因而相较传统的诗文评而言更具科学的方法论意义,这也彰显出胡适的新史家意识。诚如陈平原指出:“胡适治学之所以能独辟蹊径,一个重要原因是其‘方法的自觉’。”^[211](P193)胡适不仅发现了新体诗于一时代的重要意义,还为如何做新体诗提供了一个具体做法:

我说,诗须要用具体的做法,不可用抽象的说法。凡是好诗,都是具体的;越偏向具体的,越有诗意诗味。凡是好诗,都能使我们脑子里发生一种——或许多种——明显逼人的影像。这便是诗的具体性。^[121](P145)

关于抽象与具体的进一步思考有待回到清末民初的历史现场。胡适将诗体解放视为做新诗的根本方法,一定意义上是对新史家梁启超所言“新文体”的承续与超越。梁启超曾说道:“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学者竞效之,号新文体。”^[221](P278)“新文体”对古文的大解放在一定程度上启发了胡适关于诗体解放的思考。“新文体”的写作范式 and 具体形态又为其做新诗提供

了相关的方法与路径引导。他在《中国新文学运动小史》称赞梁启超道：

每遇一个抽象的题目，往往列举譬喻，或列举事例，每一譬喻或事例各自成一段，其体势颇像分段写的八股文的长比，而不受骈四俪六的拘束，所以气势汪洋奔放，而条理浅显，容易使读者受感动。^[9](P109-110)

胡适在《谈新诗》中强调抽象的题目、材料要用“具体的写法”^[12](P146)，其理趣与梁启超“列举譬喻、事例”的史家笔法颇为一致，而其提倡大胆的试验精神与科学实证方法，实有功于“新史学”在文学批评领域的拓展。质言之，源于“新史学”科学质素的嵌合，以《谈新诗》为代表的中国新诗批评迈向了更具理性思辨的科学化进程。

三、以文入史：“新史学”与《谈新诗》的批评意图

诚如有学者指出：“近代‘新史学’的主要特点，就是突出了史学的‘致用’功能。”^[23](P39)梁启超对“新史学”的提倡有着明确的社会功用意图，其《新史学》一文的根本着眼点就在于史学于民族国家建设之重要性：“今日欲提倡民族主义，使我四万万同胞强立于此优胜劣败之世界乎？则本国史学一科，实为无老无幼、无男无女、无智无愚、无贤无不肖所皆当从事，视之如渴饮饥食，一刻不容缓者也！”^[3](P501)《新史学》揭橥了“史界革命”的发生，提倡为国民写史、为今人著史，赋予“新史学”救国救民的重大使命，引发了新史书编写的热潮，诸如曾鲲化的《中国历史》、夏曾佑的《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刘师培的《中国历史教科书》等都试图通过历史教科书振兴民族，启蒙民众。胡适于1919年发表的《“新思潮”的意义》一文，便是站在“新史学”的立场，以评判的态度来重新估定一切价值^[12](P552)，倡导整理国故运动，为的是再造文明。同年，他还发表了著名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以平等的眼光将儒家之外的学派与孔子并列，自称“这在1919年[的中国学术界]便是一项小小的革命”^[24](P210)。推究起来，这里所谓“革命”包括两层意义：其一，胡适将反儒、非儒的思想家，如墨子等一并纳入大纲，可谓思想上的革命；其二，该著述一改既往传统的排版、语法、标点与语言文字表述等，体现了白话文学革命主张在史学著述领域的积极尝试，是形式上的革命，二者都服务于其经世致用的意图。由此可见，对致用功能的强调是晚近以来中国“新史学”的共同价值取向。

由于清末民初学人大多文史兼修，能从容游走在文、史之间，致使其在“新史学”领域的致用观也或多或少波及文学地带，主要表现为以不同文学形式进入历史的文学诉求。梁启超等新史家强调“新史学”的致用功能，但考虑到史学著述深奥晦涩而国民读史能力匮乏，便将通俗易懂的小说作为历史的简明读本来启蒙民众，正所谓“经义史故，亟宜译小说而讲通之”^[13](P29)。在“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3](P460)的社会功利目标之下，新小说自觉承担起这一历史重任。还有被誉为“新史学开山”的王国维，虽反对过于追求文学的社会功用价值，但主张以文学慰藉、改造人心，事实上也体现了一种“审美功利主义”^[25]。正如其《红楼梦评论》将“诗歌戏曲小说”视为艺术的顶点，是因“其目的在描写人生故”^[26](P59)。

胡适则打通文史的界限，以文入史是他的一种实践策略。具体而言，《谈新诗》一文如何介入历史？我们可以从两个层面理解：其一，兼具文史身份的胡适以新诗批评的方式参与历史大事，旨在通过《谈新诗》一文为仍摆脱不了怀疑的新诗争取合法地位，以实现文学革命的需要。《谈新诗》开篇即指出，文学革命是辛亥革命八年来的一件“大事”，继而又云：“与其枉费笔墨去谈这八年来的无谓政治，倒不如让我来谈谈这些比较有趣味的的新诗罢。”^[12](P134)既说“八年来无谓的政治”，但《谈新诗》的副标题又为“八年来一件大事”，两者间似乎构成一种隐性的矛盾和对抗，而后又以“比较有趣味的的新诗”一语进行消解。也即是说，胡适选择谈“比较有趣味的的新诗”来代替谈“八年的无谓政治”，以看似隐晦的方式参与了文学革命的实际活动，此当可视为其“以文入史”批评意图的显露。胡适在《尝试集》自序中回答了“为什么要用

白话来做诗”,这“可以算是《尝试集》产生的历史,可以算是我个人主张文学革命的小史”^[18](P70)。事实上,《谈新诗》一文也具有相同的旨归。其二,胡适以个人主张文学革命的“小史”切实参与八年来的历史“大事”,其意图恰在于:作为新诗批评的《谈新诗》兼具了“诗歌记录”与“反映重大历史事件”的“诗史”之意^[27],足以补史之缺。《谈新诗》选评了一些能体现胡适诗学主张和新诗发展理想的新诗,除了他自己的诗,还辑录有周作人《小河》《两个扫雪的人》、沈尹默《人力车夫》、俞平伯《春水船》等。它们不仅共同反映了早期诗坛的创作实绩与历史风貌,亦映射出现实的社会民生与社会思潮,使《谈新诗》具备了以诗补史的重要价值功能。胡适还用历史进化的眼光看待中国诗歌的变迁,总结了从《诗三百》至南方骚赋体、五七言古诗、词直至近来新诗的诗体解放之路,勾勒出中国新诗发展进化的历史图景。值得注意的是,在《谈新诗》开头,胡适指出1917年以来文学革命“可算是传播得很广很远了”,并列举了这两年来所创造的一些实绩,如高一涵《一九一七年预想之革命》、胡适《文学改良刍议》《建设的文学革命论》、陈独秀《文学革命论》等,认为它们都属于对文学革命的支持与响应之声。《谈新诗》也指出:“只有国语的韵文——所谓‘新诗’——还脱不了许多人的怀疑。”^[12](P133-134)这就从侧面反映了当时诗坛广泛存在的质疑与批评之声。将胡适《谈新诗》与《尝试集》的自序相对照可知,二者蕴含的两种声音分别映射出中国新诗发生语境下相对立的两种论调和立场,它们共同还原了中国早期诗坛的复杂场域;不仅如此,作为推行诗学主张和理想的重要文本,它们还一同承担起建构新诗史的重大使命。这种回到新诗发生与发展的初始语境及历史现场的作法一定程度上源于新史家立场对胡适从事新诗批评活动的内在规约与理路指引,也体现了胡适以文人入史的意图。

《谈新诗》并非胡适打通文史,以文人入史的个案。作为文史之作结合典范的《白话文学史》更是有意通过历史研究为白话文学革命张目:“我要人人都知道国语文学乃是一千几百年历史进化的产儿”^[28](P149),其主张极具历史的眼光。在胡适看来,白话文学与民间文学关联匪浅,“一切新文学的来源都在民间”^[28](P160),中国文学史“稍有生气者皆自民间文学而来”^[29](P30)。这与“新史学”所提倡的从君史到为国民写史的观念具有内在一致性。梁启超在《新史学》中指出,中国之旧史无一为国民所写,仅是为朝廷君臣所作的二十四姓之家谱。邓实也在《史学通论》中强调中国三千年的历史仅是朝史、君史、贵族史,而非国史、民史、社会史。刘师培则在《新史篇》中指出,中国所存之史多为“一家一姓之事”,还在《〈中国历史教科书〉凡例》中批判中国旧史之叙事“详于君臣而略于人民”^[30](P62,252)。可见,批判一家一姓之历史、建构全体国民之历史为中国新史家所达成的共识。胡适的《白话文学史》正契合了“新史学”的撰述倾向,可以被视为“在文学史领域内对‘社会史’和‘民史’的实践”^[31]。此外,胡适的小说考证也是打通文史的实践文本。他曾将《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儒林外史》等视为“国语教科书”^[12](P47-48),后来专门做《〈红楼梦〉考证》《〈水浒传〉考证》等,为的是在现代历史考证的视域下赋予小说“国语教科书”的合法地位。他自言:“所以我们这一文学革命运动,事实上是负责把这一大众所酷好的小说,升高到它们在中国活文学上应有的地位。”^[24](P229)将历史研究的方法与白话小说相结合,不仅将小说考证纳入了学术研究范围,还通过科学方法的运用,在梁启超的新小说基础之上进一步确证了白话小说的合法地位,为文学革命呐喊助威。纵览胡适的新文学实践,可窥见一名新史家进入历史的文学诉求,也可佐证其新诗批评的入史意图。

不仅如此,《谈新诗》作为《白话文学史》的先声还承续了“新史学”为民写史的思想,可视作胡适在新诗批评领域的民史实践。在《谈新诗》中论述四次诗体大解放时,胡适为何要将《三百篇》《焦仲卿妻》《木兰辞》以及李后主的词等视为诗体解放的代表?一方面固然是为了说明诗歌需要打破种种束缚,才能迎来诗体的解放;另一方面则因为它们都是白话的且来源于民间。在《中国文学过去与来路》一文中他明确指出:《三百篇》、五七言诗、乐府等文学史上“有生气者”都是来自民间,而且新文学的来路之一便是民间文学^[29](P30-31)。足以见得,他在试图从民间文学的历史上寻找新诗合法性的同时,也提供了一条新诗创作与批评的思想进路,即从民间文学中汲取资源,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表征了“新史学”从君史到民史的

观念演变。

四、结论

不论是梁启超的文、史相辅而行，还是鲁迅治史与文学创作、批评的互动，抑或是胡适对史的关注以及对文的诉求等，都体现了近现代之交文史互动双生的风貌。倘若我们忽视文史双栖所赋予这两代学人的巨大张力，无论对史学还是文学研究领域都是一大遗憾。令人瞩目的是，跨学科的理念和方法为当今文学研究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学理来源和动力。我们采取文史对话以及回到历史现场的研究范式考察“新史学”与《谈新诗》之间的学术渊源，正是立足于文学本位以及当今文学研究明显的史学化、历史化趋势，对“新史学”与“新文学”关系的本源性思考与跨学科想象。

就《谈新诗》一文而言，胡适依靠“新史学”的核心观念与方法，为新诗批评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呈现出历史和科学的双重维度，彰显出一名新文学家的历史尺度，也为其“以文入史”批评意图提供了历史合法性依据。诚如朱自清所言：胡适的这些主张大体上令《新青年》诗人所信服，不仅如此，《新潮》《少年中国》《星期评论》和文学研究会诸作者“大体上也这般作他们的诗”^[1](P241)。虽然《谈新诗》在新诗史上的特殊位置和意义已被学界所注意，但若只关注其文学的一面，不留意《谈新诗》中隐含的“新史学”元素与价值，则难以发掘“新文学”与“新史学”之间的特殊张力和内在链接。就此而言，或正是因为“新史学”一定程度的介入，《谈新诗》成了那一时期新诗批评的范式与价值导向。二者互动的意义主要在于：一方面，融注了“新史学”观念和方法的20世纪初新诗批评，不仅逐渐摆脱了既往基于作品鉴赏与文学经验为主的批评范式而趋于理论化、系统化，彰显出历史和科学的新时代面貌；其时的新诗批评还突破了传统的历史语境与文化空间，被纳入了一个更大的社会公共场域，承担起参与文学革命、诗史建构等历史重任。另一方面，由二者之互动亦可窥见，“新史学”不仅成为中国现代新诗发生与发展的内在动力机制与另类机缘，还通过与20世纪初新诗批评的跨领域对话不断构建并丰富了自身的理论体系，促进了中国“新史学”的向前发展。

在文史互动视域下，“新史学”赋予20世纪初新诗批评的全新面影，使之具备了文史交叉的形态。钩稽“新史学”与胡适《谈新诗》的关联性，当可见“新史学”之于胡适文学观念的特殊位置和重要功能及其对于中国现代新诗的发生学意义，亦勾勒出一条“新史学”与“新文学”之间隐秘而又深刻的互动轨迹。

参考文献

- [1] 杨匡汉，刘福春. 中国现代诗论：上编. 广州：花城出版社，1985.
- [2]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 中国现代学科的形成.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 [3] 梁启超全集：第2集.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
- [4] 杨念群，黄兴涛，毛丹. 新史学：多学科对话的图景：上册.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 [5] 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增订版.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 [6] 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 北京：中华书局，1977.
- [7] 胡适文集：第3册.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 [8] 胡适文集：第5册.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 [9] 胡适文集：第1册.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 [10] 李敖. 胡适评传. 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0.
- [11] 关爱和. 梁启超“新民说”格局中的史学与文学革命. 文学遗产，2018，(5).
- [12] 胡适文集：第2册.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 [13] 陈平原，夏晓虹. 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1卷.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 [14] 梁启超全集：第3集.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
- [15] 梁启超全集：第15集.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
- [16] 许冠三. 新史学九十年. 长沙：岳麓书社，2003.

- [17] 罗尔纲. 师门五年记·胡适琐记:增补本.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6.
- [18] 胡适文集:第9册.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 [19] 陈均. 中国新诗批评观念之建构.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 [20] 丁国旗. 寻找公共性——文学批评的意图. 山东社会科学, 2018, (10).
- [21] 王瑶. 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 [22] 梁启超全集:第10集.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8.
- [23] 蒋俊. 中国史学近代化进程. 济南:齐鲁书社, 1995.
- [24] 胡适口述自传. 唐德刚译注.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3.
- [25] 杜卫. 王国维与中国美学的现代转型. 中国社会科学, 2004, (1).
- [26] 王国维全集:第1卷. 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 2009.
- [27] 侯体健.《集杜诗》:三重文本张力下的“诗史”建构. 文学评论, 2019, (3).
- [28] 胡适文集:第8册.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 [29] 胡适文集:第12册.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 [30] 李帆. 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刘师培卷.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5.
- [31] 王东杰.“价值”优先下的“事实”重建:清季民初新史家寻找中国历史“进化”的努力. 近代史研究, 2012, (3).

Literary "Minor History" and Historical "Major Events"

A Stud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ew Historiography and the Critical Theory And
Path of Hu Shih's *Talking about New Poetry*

Luo Yihua, Luo Yuxin (South-central Minzu University)

Abstract A new historian as well as a new literary scholar, Hu Shih highlights the dialectic of "history into literature" and "literature into history" in his criticism of new poems. On the one hand, he took the core concepts and methods of the "New Historiography" and integrated the "evolutionary" view of history and scientific empirical evidence into the article *Talking about New Poetry*, giving it the dual dimensions of history and science, following the critical line of reasoning of "history into literature". On the other hand, his participation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history of new poetry with the article *Talking about New Poetry* reflects his literary aspiration to enter history with new poetry criticism, giving expression to his critical intention of "entering history with literature".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literature and history, to probe into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New Historiography" and *Talking about New Poetry* will provide a concrete and subtle circumstantial evidence to catch a glimpse of the role and function of "New Historiography" in Hu Shih's conception of literature, and the hidden connection between "New Historiography" and "New Literature".

Key words Hu Shih; new historiography; *Talking about New Poetry*; new poetry criticism; new literature; interaction between literature and history

-
- 作者简介 罗义华,中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湖北 武汉 430074;
骆羽芯(通讯作者),中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
- 责任编辑 何坤翁